



文化研究新议程： 财产、审美化 与全球化

虞建华 金惠敏 主编

文化研究新议程： 财产、审美化 与全球化

虞建华 金惠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新议程: 财产、审美化与全球化 / 虞建华, 金惠敏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46-3785-5

I. ①文… II. ①虞… ②金…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058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蒋浚浚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3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785-5 / G · 1179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编者前言	1
------------	---

特 稿

1. 周 敏：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的一个反思 和期待	6
2. 金惠敏：文化理论究竟研究什么？	14

第一编 财产问题与文化研究

3. 肯尼斯·苏林作, 沈江平译：财产的归宿：新自由主义谜局	22
4. 罗伯·希尔兹作, 刘 莉译：麦克默里堡的故事	29
5. 陈奇佳 罗 璇：论马克思对“内在财富论”的批判问题	42
6. 金惠敏：财产作为再现——对老子财产观的一个后结构主义 阅读	57

第二编 消费、市场与文艺

7. 迈克·费瑟斯通作, 虞建华译：奢侈品动力论	86
8. 高建平：从市场的变迁看艺术的命运和使命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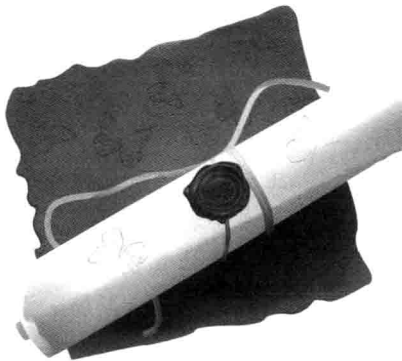
9. 虞建华: 作为象征资本的大写的“ME”: 文学的市场化与作家的定位	124
10. 刘方喜: 剩余价值流转中的符号: 当代艺术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哲学分析	138
11. 周 敏: 德里罗《地下世界》的“垃圾”美学	156

第三编 媒介与美学

12. 艾琳娜·兰伯特作, 李昕揆译: 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	168
13. 李昕揆: 印刷术的视觉偏向及其美学后果	182
14. 赖纳·温特作, 张健然译: “所有幸福的家庭”: 《黑道家族》与 21 世纪电视文化	193
15. 李 勇: 美人·美女·美学: 中国古典文化与美学“悲”性精神的当代转向	205
16. 玉利智子作, 范小青译: 建筑学·新陈代谢派: 日本美学的再出发	224
17. 丛新强 王茂林: 论布尔迪厄的传播思想	236
18. 郭 可 吴 瑛等: 全球媒体中的上海世博会舆情分析	263

第四编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艺术

19. 李世涛: 重构全球化的抵抗空间——詹姆逊的全球化理论	284
20. 乔纳森·哈里斯作, 罗如春译: 21 世纪的全球化与艺术	299
21. 殷企平 周 怡: 空间、文化唯物主义和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	306
22. 汤姆林森 金惠敏作, 李昕揆初译: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约翰·汤姆林森教授访谈录	324



编

者

前

言

《文化研究新议程:财产、审美化和全球化》在诸多学者和译者的积极参与合作下,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协助支持下,终于付梓了。这令我们兴奋,也让我们对这本著作可能产生的辐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充满期待。论集的书名指向三个关键词:财产、审美化和全球化。这三个方面都是重大议题,但这里的讨论并非就财产论财产,或局限于审美领域谈审美化,或在整体概念上讨论全球化。论文大多讨论的是三者间某个方面互相交叠、覆盖、衔接和碰撞产生的文化意义,连接了许多学科的边界,并首次将财产与美学置入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把我们引向文化研究的新议程。议程是开放性的,讨论刚刚开始,从这里可以走进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

书名来自2011年9月22-24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财产、审美化与全球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集子收录的大多数论文也是这次研讨会上宣读的文章^①。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与新闻学院主办,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理论、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心以及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传媒系协办,规模不算大,但名家云集、高朋满座,称得上是一次思想的盛宴。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对象是国内外研究所/中心、高等院

^① 本论集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增选了若干篇与会议主题相关密切的非会议论文。



校和文化刊物的学者,包括英国著名学者、《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迈克·费瑟斯通教授,奥地利著名学者赖纳·温特教授,加拿大著名学者、《空间与文化》主编罗伯·希尔兹教授,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斯·苏林教授,日本学者、《身体与社会》执行主编玉利智子博士,德国著名学者卡斯滕·温特教授等,以及高建平、金惠敏、金元浦、殷企平、黄卓越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的国内著名学者。

国内外学者们从各个视角——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传播学、文学和哲学——对文化理论和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样的讨论又与当今全球化态势紧密相连。学者们参与的热情和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和高热,让那个夏意未消的金秋天气更显得热气腾腾。迈克·费瑟斯通教授的主题发言聚焦于奢侈品这一消费社会全球性的现象,从文化理论上对其进行解剖和阐释;赖纳·温特教授通过一部走红电视连续剧的个案,从全球文化研究、传媒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解析当下欧美电视剧的受众结构、经济美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高建平研究员通过人们熟知的商业现象,引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的艺术及两种不同的“艺术终结”观的思考;东道主虞建华教授通过一部“自传体”小说的文化解读,讨论后版权时代的文学市场化的问题;金惠敏教授为会议做了学术总结,特别强调了美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呼吁文化研究中对审美问题的关注。研讨会的几位主题发言人,各自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见解和问题,都密切关注“文化全球化”趋势带来的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变化,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 and 对策。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始于文学,是对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为主导的一度成为行业运作规则的文学精致化研究取向的一种反拨,从专注于结构、语码、修辞、对话等方面技巧性的“文内”研究走向“文外”研究更加宽广的天地,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使命。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而如王宁教授所言,是“有着一段漫长历史的一个潜概念在当代的复苏”^①。尤其是当文学专业出身的杰姆逊,从理

① 王宁:《后现代之后》,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论上把文学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推向了文化之后,“复苏”呈现一种强势崛起的态势,成就了今天文化研究的火热场面。如今文化研究的范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跨越了学科边界,又与众多学科相衔接,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领地,尤其是那些为传统文学研究所不屑的亚文化和与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领域,而且其范围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势头。这种伸展和蔓延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文化的概念本身涵容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步跨进“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的美国,描述为一种“文化沸腾”的状态^①。时代变迁与人的意识、文化重构与传统之间的各种矛盾剧烈摩擦碰撞,产生高温,几乎完全重塑了一代人的文化态度和日常行为模式。可以说,我们正处于又一个“文化沸腾”的时代。杰姆逊 20 年前在《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快速变幻的当代文化风景的描述,至今仍然让人感同身受:整个文化正经历着一次从语言中心朝视觉中心转向的革命性变化,一切事物都只有短暂的呈现,但都不会有长时间的重大的停留。他把视觉文化的盛行视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对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视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窗口:“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②。文化的“视觉转向”改变了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解读充斥着各种各样视觉符号的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这个讲究“视觉快感”的时代,是今天学界面对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巨大课题。

文化研究尚没有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划分清晰的专属领

① Malcolm Bradbury. "Prefac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 Malcolm Bradbury and David Palmer, ed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p.6.

②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427 页。注:即文章中的“杰姆逊”。

域。它的跨界性和包容性,正是它的潜能和力量所在,指向文化研究广阔的前景。它异军突起,大大拓展了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增强了研究的活力。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各自的研究侧重不同,但对当代文化的共同关注——即使,比如说,是对老子财产观的讨论,也必然是一种当下性的再思考——把大家聚拢到了一起。各国文化研究学者之间的这种跨文化交流,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异文化体验和认识,对全球文化研究中融入中国学者的声音,对推动中国文化研究走向国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所有为这本文化研究论集贡献文章的学者以及为国外论文翻译奉献辛勤劳动的译者,正是你们的智慧、才识和卓见,才使得这本论集的出版成为可能。我们相信它是有生命力的,相信它能给学界带来启迪,并促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2013年初夏

特 稿



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

——对文化研究的一个反思和期待

周 敏

内容提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丧失。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事业，应该适时地发展文化研究的理论维度，这既是学科性的，即从文化研究走向文化理论，也是理论批判意识的自觉。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雷蒙德·威廉斯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或丢弃，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丧失。在其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对他所谓的“文化理论”冷嘲热讽，尽显其残酷而优雅的风格：

一切是再明显不过了。研究乳胶（代指性——引注）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躺在床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于是，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从电视机前离开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摇滚乐在过去是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对象。智识事务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的

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罢了。^①

虽然他所称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后现代的法国理论,但实际上这里则更是针对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一如伊格尔顿上述的描画,就是智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甚至最终可能的融为一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相接近,这或可叫做“日常生活学术化”吧!对于日常生活,这结果是什么,伊格尔顿没有说;但对于知识或学术,伊格尔顿则明白无误地警告,这将最终导致对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丧失。

客观地说,伊格尔顿此言真是一个洞见。文化研究的任务,就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论可能怎样地被“文化工业”所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因而便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对媒介信息的处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是,它绝不相信什么“文化工业”的腐蚀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质询”和构造(阿尔都塞)。例如,大卫·莫利就认为,观众不仅有自己的语码,那尚在话语的层面,他们更有自己的生活语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会解构媒介话语的强势灌输。如果可以认为“话语”或“意识形态”有时是致幻剂,那么“生活”则是它们最为彻底的解药。文化研究当然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将日常生活本体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能够反思日常生活。这是伊格尔顿的忧虑所在。

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崇拜,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新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②;接着,在其《漫长的革命》(1961)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

① 泰瑞·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年,第14页。

②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9, p.xvi.

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①。威廉斯“文化”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质的”生活和物质性的“体制和日常行为”纳入“文化”的范畴。尽管他没有将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质性文化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最终会导致其批判功能的丧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无意识”地生活着。而现今广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概念,其“物质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质形态外,另外一个未被注意的内容就是“无意识”。不是詹明信的“文化无意识”。而是文化,即无意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无意识乃是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

作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霍尔则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对他来说,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对阐发现实文化问题有用。他曾经向访问他的中国学者表白: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②。在霍尔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显然是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层次。莫利也不时地嘲笑理论,说理论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赚取更多的教席和学生。不过也有人还嫌不够,要求霍尔所领导的“文化研究”应该回归到社会学的本位,肩负起社会学的重任,因为据说霍尔多少还有些“话语转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现代嫌疑^③。

文化研究的当前变化可以说愈来愈“非理论化”了。在英国 有托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41.

② 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 参看 Brennon Wood. “Stuart Hall’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hegemony”,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0, No 3, 1998.

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转向,他将文化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governmentality)而非“抵抗性”。本内特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确,他在开放大学接替霍尔的社会学教授一职,也可以说象征着英国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义”转向。如果说霍尔将“理论”转化为“批评”,此时“理论”尚有存留,那么本内特则是将“批评”修正为实证/科学“研究”,理论终于变得可有可无了。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好像就从未“理论”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这当然与本内特的言传身教有关(他曾执教于澳大利亚)。目前文化研究课程在欧洲高校正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多是在传媒系科,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很少引起“哲学”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抢滩中国,在与文学研究发生过激烈而短暂的交锋后,旋即毫无争议地转入文学研究者比较陌生的文化产业研究了。文化产业研究者认定,一方面,文化可以经济化——文化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另一方面,经济也要文化化,就是说,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通俗地说,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需要“符号化”和“审美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本内特们或者中国文化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这类对文化的应用性研究都将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某种程度的沦丧。文化产业研究是没有立场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替利益张目,而非为“文化”执言。文化研究演变到文化产业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门实用经济学,它绝非“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在其起源处的政治情结至此消逝殆尽。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论本来是一种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社会批判理论,而现在许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却鼓动将它拿来打造产业“品牌”形象。抛弃了批判理论,文化产业将只会生产“景观”(spectacle)或“拟像”(simulacrum,一译“虚像”),一种歪曲真实的虚假形象。君不见,在影视界,我们的前卫编导们不知生产了几多“中国拟像”,不,是“拟像中国”,与真实中国无关的“拟像”。他们不对真实负责。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另一发展是由各路学者纷纷涌入的所谓



“文化批评”,其中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则很明显,就是它对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等的本体性依赖。文化批评的声音多在這些場所出現。大眾媒介是深受市場定律的制約的,發行量、收視率、點擊量無時不在折磨着媒介人的神經。在這樣的場所,“文化批評”當然不可能有什麼獨立的作為,它必須跟着市場走,必須吸引眼球,否則就不給上版、上鏡、上傳。大眾媒介似乎有時也歡迎一些“獨特”的聲音,批評好像還是有自己的空間的,但別忘了,它要你的獨特,是用你的獨特在做賣點!大眾媒介時代的文化批評難逃一種偽文化的“大眾批評”的厄運。歐洲理論新星齊澤克對文化研究持悲觀態度,但他的悲觀却不是毫無道理的。他發現,文化研究對權力的反抗正好為權力所需要,因為權力正是通過對差異的承認和整合來建立和穩定自身的。我們不是整個否定文化批評,它至少還給大眾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間,我們在此僅僅是想提醒,文化批評可別忘記了“理論”和“反思”。而對那些只會哗眾取寵的、迎合市場的所謂“文化批評家”、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或販賣“激進”,或販賣“保守”,惺惺作態,裝瘋賣傻,假冒先知,而事實上——我們無須去提醒,他們比谁都“清醒”,他們無非是在演戲,“賣藝”。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体论”的,而理论则是认识论的,它假定主客体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们无论如何“弃智绝圣”,如老庄哲学所号召的那样,都不能将认识主体取消干净。当我们与自然一体时,我们将不再是能够认识的人;而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那么“认识之眼”将是我们最基础的本质。而且,我们知道,“理论”的拉丁语原义是“观看”。当年胡塞尔之所以无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义,非其不为,是逻辑之不能也。庄子难题“子非鱼”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但它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举“生活本体论”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将不会形成“观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的、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其实,它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体之绝对支配地位

的认定,而不是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论。德里达何以认为意指总是被“延异”,因为二元论的认识论,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和张力永远无法克服。就此而言,解构,甚至包括一切后现代主张,都不是对认识论的取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而尝试创新认识论。解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

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反,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则试图消灭认识论,它将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基础化和本体化。认识不再独立于世界,它是我们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前见”甚至是“偏见”都没有什么可怕,它们构成我们的基本存在,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进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前见”,我们无以理解。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传统”。解释学要的是“真理”,反对的是“方法”。对伽达默尔来说,“方法”是认识论的同义词,而“真理”则没有“认识”的“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那部名著《真理与方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当把“理论”、“认识”、“方法”统统本体化之后,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活化”,那么由谁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缺少这个反思的维度,威廉斯和霍尔则更是未曾想到过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理论大厦将顷刻间崩塌。

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理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在这事实背后则是反思精神的匮乏,是认识论距离的消失。拥抱日常生活,当然不错,因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但这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着多少的文化和观念的沉积呀。换言之,生活从来就是文化的。将文化彻底地生活化,将可能使那些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护起来,移出我们的批判视野,逍遥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尔与纳粹政府的同流合污不是没有哲学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就不会如此。唯美主义乃是文化批评所要批判的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性”(如对阿诺德的批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英国文化研究也有向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



判理论方向的努力。英国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的社会批判事业。德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赖纳·温特(Rainer Winter)教授以威廉斯的著作为例,将英国文化研究当作一种批判理论来理解。他认为:“威廉斯,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布尔迪厄十分相像,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干预性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将学术世界与日常生活联结起来”^①。但人们不会想到的是,由于对“理论”和“反思”的放弃,其中被重新定义了“文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某种妥协。例如20世纪80年代,霍尔呼吁左派要向右派学习,要从“撒切尔主义”的右派改革中汲取教训。再如,菲斯克对消费社会的游击战理论,莫利关于电视观众对强大媒体的积极接受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也是要人们放松对消费和媒介之控制和霸权的警惕和抵抗。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无需积极地组织抵抗,因为抵抗是天然地发生的。

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已经在全球展开。在中国,文化研究也有了十几年的历史,而且正势不可挡地向各个学科蔓延。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事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其先天的不足以及后天的局限。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将文化研究从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发展其理论的批判性力量,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学科性的要求,但更是一种批判意识的自觉。

作为文化理论的文化研究,将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面貌?其具体议程是什么?其与现实问题的切点在哪里?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目前有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就是结合我国本土的文化理论资源,发展和建构出一种能够回应我们当代现实问题的文化新理论。如此说来,霍尔等“反理论”的宣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昭示我们,理论追求着普遍,然其无往而不在“地方性”之中。地方性的理论,其“普遍性”将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对解决世界共通问题有借

① Rainer Winter, “Culture, Critique and Radical Democracy: Raymond Williams’ Works and his Significance for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Present”, 载《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手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编,北京,2008年9月,第6页。